

邵 声

众所周知，威尔逊在一战期间领导美国抛弃了建国以来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路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创建一个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之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思想。然则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不但频频破坏威尔逊提出的自由贸易、削减军备等国际合作原则，而且还常常扰乱美国自己构建起来的现行国际秩序，以至于很多人担心美国的孤立主义可能会就此卷土重来，继而影响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走向。值此背景下，我们在一战结束百周年之际，有必要重新回顾美国外交政策在一战中由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的过程和原因，思考和总结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趋向。

一百多年占据美国主流的中立政策

孤立主义外交是乔治·华盛顿等开国领袖在立国之初为美国外交定下的一项基本国策，其核心思想是美国应该在国际政治中保持独立和中立，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以免因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被拖入他国的纷争之中，殃及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孤立主义路线是美国在建国初期制定的一项自我保护政策，其目的是保障新生的、弱小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但是，“孤立”并不意味着“封闭”，美国的孤立主义决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避免卷入欧洲的内部纠纷，但在经济上却始终与欧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扩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贸往来。而在同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交往过程中，美国还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地对这些地区进行政治干预，甚至军事干涉。在建国后的一百多年里，孤立主义外交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贯彻和执行，并成为了美国精英和大众的共识，变成了美国的一项政治传统。

然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崛

一战促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

起为世界大国，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已深深卷进欧洲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继续维持超然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孤立地位已显得不合时宜。在此形势下，国际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兴起，主张美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建立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不过在一战以前，由于孤立主义观念已在美国根深蒂固，国际主义思想始终未能转化为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战起因于巴尔干地区的一次意外刺杀事件，但根源于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之间民族矛盾和殖民冲突的长期积累。然而，触发此次战争的这些原因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尽管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在大战伊始就已洞察到这场战争可能会打破欧洲的均势并最终危及美国的安全，但大部分美国人却依然乐观地相信，美国只要一如既往地对外战奉行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便可置身事外，高枕无忧。于是，威尔逊在1914年8月4日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半月之后，他又发表演讲，提醒民众“美国不仅必须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我们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上不偏不倚”。

美国朝野上下在大战之初之所以倾向于选择中立政策，除了受孤立主义观念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社会正致力于推进国内的进步主义改革，把外交事务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战火不断，所以多数美国人都以为这场冲突也只是一场常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其次，美国与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均存在矛盾，不愿看到任何一方大获全胜。1914年8月22日，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坦言：“如果协约国赢了，就意味着俄国将主宰欧洲大陆；如果德国赢了，就

意味着其恶难以言状的军国主义独裁将降临在未来好几代人头上。”

一战迫使美国放弃中立政策

然则在执行中立政策的过程中，美国的外交传统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为了防止因任何一方获胜而导致欧洲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改变，豪斯劝说威尔逊利用美国的中立地位对外战进行斡旋，说服交战双方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恢复欧洲原有的均势。威尔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1915年初至1917年初，多次尝试调停英、德等国，但最终因交战双方的停战条件相距甚远，这些调停均以失败告终。然而这些调停活动却改变了美国之前对于欧洲事务完全不闻不问的做法，标志着美国长期推行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发生了转变。1916年2月，美国与英国达成《豪斯—格雷备忘录》，承诺如果协约国愿意参加和平会谈，而德国拒绝接受，美国将“可能”参战反德。这意味着美国已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干预欧洲的战局。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呼吁交战国达成一种“没有胜利”“没有赔偿”和“没有兼并”的和平。他认为，这个和平的基础必须是国家平等、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裁减军备等原则，并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维护这些原则，确保世界和平。威尔逊的这些倡议与原则表明了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正在酝酿和形成，反映出美国不仅要介入欧洲事务，还要创建一个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来代替由欧洲建立起来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国际旧秩序。威尔逊在外交路线上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美国中立政策的困境。

事实上，在威尔逊宣布美国中立

以后，美国政府与民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难以做到绝对中立。首先，美国与协约国的经贸往来使美国与协约国之间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战爆发后，英国迅速利用其强大的海军切断了同盟国的海上贸易，美国因此只能与协约国进行贸易往来。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贸易总量急剧增长。这一方面是协约国要从美国进口大量军用品资以推进战争；另一方面也是美国要通过扩大出口来拉动本国经济，夯实国内进步主义改革的经济基础。为了保障协约国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美国的货物，美国政府甚至还允许本国银行向协约国贷款。其次，美国与协约国的经贸往来引发了同盟国的不满与攻击。德国对于美国一边宣称中立，一边向英国贩卖军需的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德国从1915年初开始决定以潜艇战来击沉所有进出英国港口的船只，阻断英国的补给，逼迫英国投降。德国的这一战略直接挑战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中立地位。在随后两年里，德国潜艇因在多次袭击中造成大量美国公民死伤，美德矛盾不断激化。再次，多数美国人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协约国。由于美英之间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特殊联系，大部分美国人都更愿意支持英国。而英国在美国的战争宣传也强化了美国人对同盟国的敌意。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美国中立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协约国。1917年初，随着“齐默尔曼电报”被揭露，美德关系完全破裂。同年4月6日，美国放弃孤立路线和中立政策，正式对德宣战。

历史变革催生了国际主义

不难看出，美国在一战中之所以



1918年1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与法国总统庞加莱在巴黎大街上庆祝战争结束

放弃孤立主义，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经济的扩张，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已深深卷入到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美国在与欧洲保持经贸往来的同时，很难再在政治上超然物外，尤其是在自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而美国最终在外交上选择国际主义和介入一战，就是希望通过恢复世界和平和重建国际秩序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1918年初，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倡议各国按照公开外交、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等原则创建新的国际体系，并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护该体系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十四点计划”随后在巴黎和会上遇到一些挫折，并在美国国内遭到孤立主义思潮的抵制，但它的精神没有就此泯灭，反而在二战以后大放异彩，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虽

然孤立主义思想在二战后的美国并未销声匿迹，单边主义倾向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也不时出现，但美国的外交战略始终没有离开国际主义的大方向。这归根结底是由世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美国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决定的。事实上，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发展更加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美国不可能在抛开国际责任和国际合作后还能独善其身。因此，尽管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并推出一些带有“孤立”色彩的政策，但从整个历史趋向上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更不可能回归到孤立主义。

世界史林

季羨林的恩师们——王寿彭、吴宓和陈寅恪的“绅士风度”

游宇明

“绅士”这个词来源于西方，这种阶层一般有些社会地位，知识渊博，待人友好，讲究细节。如果勉强用汉语里的词来比附，儒家文化里的“君子”庶几近之。所谓绅士风度，其实就是绅士通常的一种为人处世的风格，季羨林先生就遇到过多位绅士。

王寿彭是清末状元，民国时期做过北京总统府秘书和山东省教育厅长，学识渊博，其书法造诣也颇高。他兼任山东大学校长时，规定山大附中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且平均分数达到95分以上者，可以受到奖励，奖品是他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 and 一副对联。某一年中，只有一位学生季羨林达到了这个要求，于是便成为唯一获得状元公王寿彭墨宝的人。扇面上是一首七律，结尾落款写道：“羨林老弟正 王寿彭”，对联的开头则这样写道：“羨林老弟雅鉴……王寿彭。”这王寿彭是个思想有点保守的人物，但对学生却颇具平等理念，不仅称学生为“老弟”，还谦虚地让他对自己的书法指“正”“雅鉴”，其绅士风度自然流露出来。

有些先生的淳朴态度也使人感动。吴宓在清华大学做教授时，替天津《大公报》主办一个《文学副刊》，季羨林等几个喜欢写作的学生，经常给副刊写书评一类的短文。按照常理，学生发表文章，报社已支付稿费，编辑并不欠作者的人情，自己的老师做编辑，文章更容易得以发表，学生反而应该感恩。然而，吴宓不这样想，他将学生向他主持的版面投稿看成是一种支持，他多次邀请季羨林等人到他的住处做客，还请他们到工字厅的教授西餐厅吃饭。

1945年，人在德国哥廷根的季羨林计划回国。得知自己的老师陈寅恪

在英国治眼疾，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10年来的学习情况，附信寄去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不久，陈寅恪回了一封长信，告诉学生自己的近况。信中说：他拟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几位先生介绍季羨林到北大任教。后来真的兑现了诺言。

具有绅士风度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舒服。绅士风度必然是友好、低调的，必须充满着利他行为，这一切无疑都会使他人感到温暖。绅士风度跟文化环境有关。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当年孔子教导学生们要文质彬彬，这是成为君子的先决条件。既不能“文胜质”，也不能“质胜文”，两者都要具备且恰到好处。所以一是不能过于自私，如果过于自私，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则与“质”的品质相违背。二是要通过礼貌礼节等方式，传达出对别人的友好，否则就不斯文，让人不舒服。这两者是一个崇尚君子的社会对一个人的必然要求。

对待一个普通的中学生，王寿彭其实可以不那么客气，毕竟他名高位显，年纪也大得多，以长辈和老师的身份说话，没人觉得不妥，他不愿这样做，只能说他的修为超过了一般人。吴宓对投稿的季羨林的厚待、陈寅恪对希望求职的季羨林的帮助，都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不做，也未必是道德上的瑕疵，他们愿意主动提携后进，格外地尊重学生，无非是出于一种希望自己学生成长进步的师者仁心，是一种额外的关爱。

这些先生的“绅士风度”，其实也是一份温热的文化遗存。

历史散叶

李帛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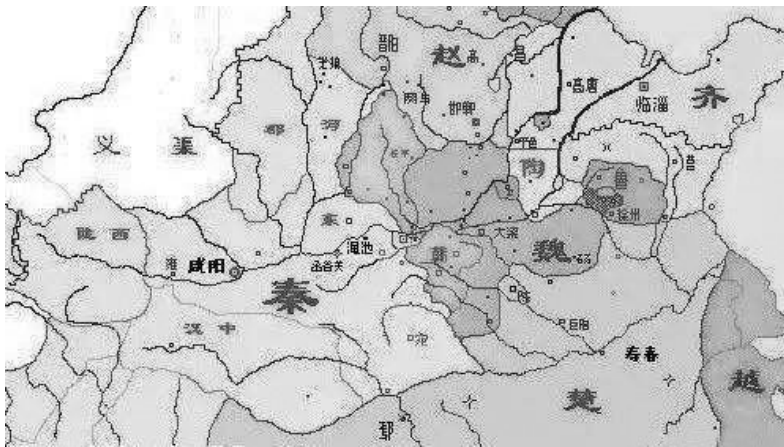
崔庆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秦国的东线战云密布，魏国相国公孙衍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兵锋直抵函谷关。秦国不敢丝毫马虎，派遣宗室名将、庶长嫪毐率领秦军精锐全力御敌。但是，此时秦国的后方却暗藏巨大风险，义渠正在等待奇袭的最佳时机。

卧榻之侧

义渠是古老的戎族部落，从殷商时代起就雄居一方，主要在泾水以北活动。秦立国之后，四周边戎狄环绕，义渠、大荔实力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义渠位置特殊，紧邻秦国北方，向南一马平川，可直抵关中平原，是秦最难缠的对手之一。

厉共公时代，秦消灭大荔之后，又攻伐义渠、“虜其王”。但义渠与位于洛地的大荔不同，拥有广阔的后方回旋余地 and 强大的再生能力。其后百余年间，义渠和秦时有摩擦，像一块牛皮糖，顽强地黏附在西北方向，有时甚至能够主动攻



义渠国与周边大地理关系

秦。到了惠文王时代，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急速向外扩展，与义渠的矛盾更加突出。

公元前335年，义渠乘秦进军韩国宜阳，在洛水大败秦军，给刚刚行过冠礼的惠文王送上了一份“见面大礼”。血性秦王岂能善罢甘休，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秦借义渠内乱之机，起兵攻伐，占领了义渠都城，其王臣服，秦乘势在义渠之地“置县”。此战看似解决大麻烦，但表面暂时的平静之下是暗流汹涌，义渠一时服软，保存了有生力量，准备伺机再动。

指东打西

惠文王初期，秦致力于巩固河西之地，对魏国步步紧逼，在公元前328年取得了重大进展，魏国将上郡十五城全部献给秦国，彻底退到黄河以东。随后，秦国加快了消化河西的步伐，于公元前324年修筑了上郡塞。此举不仅一箭双雕，而且暗中“指东打西”。一方面，上郡塞加大了秦在河西的战略纵深，与少梁城一起形成针对魏国的攻守兼备体系；另一方面，上郡塞阻隔了义渠东进之路，缩小了包围圈，明显有“打蛇”之意。

惠文王更元五年（公元前320年），秦王亲临上郡，“王游至北河”。北河是黄河在现今内蒙古地区的正北方。秦王视察北河，绝非为了领略自然风光，而是在进行战略侦察，试图从南、东、北三个方向

压迫义渠。留给义渠的时间不多了。

意外之失

公元前319年，就在秦王视察北河第二年，深感寒意的义渠王出访魏国，面对共同的对手秦国，谋求“抱团取暖”。魏国非常重视义渠的来访，魏相公孙衍极力拉拢、亲投机宜。他告诉义渠王，如果秦国和六国相安无事，就会毫无顾忌地攻伐义渠；如果秦国主动和义渠交好，那一定是和六国发生了激战，这就是义渠骚扰进攻秦国的最好时机。

说者有意，听者用心。此时的义渠王是贤能之主，心领神会，决意和魏国一西一东遥相呼应。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前318年，秦与五国联军大战在即，为了防止义渠在背后“捅刀子”，惠文王听取了谋臣陈轸的建议，用金钱美女重贿义渠，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获取后方暂时的稳定，然而这一举动恰恰暴露了自身软肋。

秦国的主动示好适得其反。按照与魏国的约定，义渠王得到了开展行动的明确信号。义渠精锐出其不意，从西北方向发起进攻，在李帛之战中击败秦军。此时，秦虽然经过献公、孝公、惠文王三代人的励精图治，国力大增，但仍不具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

辩证法则

玩鹰的反被鹰啄了眼，秦痛定

